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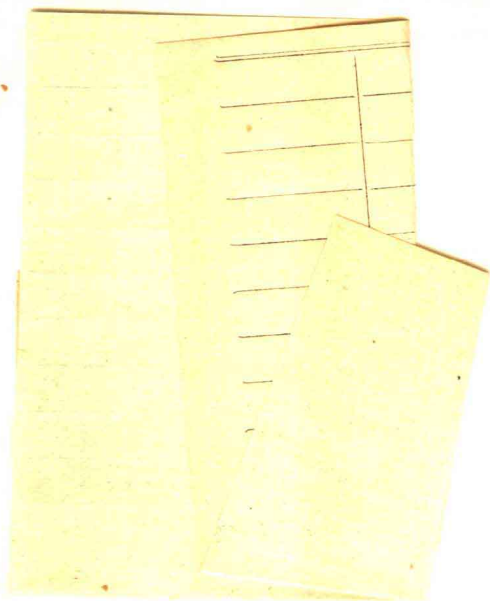


清代哲学

王 茂 蒋国保 余秉颐 陶 清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

B249

清代哲學



王 茂 蒋国保 余秉颐 陶 清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出版登记证号：(皖) 01 号

责任编辑：丁怀超 王世超
装帧设计：蒋万景

清 代 哲 学

王 茂 蒋国保 余秉颐 陶 清 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8 字数：660千字

1992年1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001—02300

ISBN7—212—00614—9/B·46 定价：(精)15.00元

序

张岱年

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：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儒墨并称显学，道家亦有较大影响。秦统一六国，焚书坑儒，哲学的发展受到挫折，至汉初而复苏。汉武帝独尊儒术、罢黜百家，百家争鸣的景况消失了。汉代经学独盛，道家之说亦流传不绝，至魏晋而玄学兴起，道家之说复盛。隋唐时代，儒释道三教并尊，而儒门比较淡泊。北宋时期，理学兴起，又恢复了儒学的权威。理学兼采道家与佛家的一些观点及思想方法而归本于孔孟之说，因受佛学的影响，特别注重心性问题，对于经世致用之学注意不够。明清之际，从事学术的明代遗民，遭受亡国的惨痛，考察明室覆亡的原因，归咎于宋明理学的空疏，于是力图黜虚崇实，达到了学术发展的新阶段。

明清之际，时在十七世纪，当时西方已进入近代社会，学术思想有飞跃的发展。而中国却仍在封建制度下徘徊。相对于西方而言，中国落后了。但清代学术较之宋明，亦有前进之处。清初的进步学者大都黜虚崇实，而所谓实者，各家意见不同。所谓实者，有训诂考据之实，有修养履践之实，有国计民生之实。但总的倾向是：力求排除宋明理学所受道家 and 佛学的影响而复归于孔孟，可以称之为孔孟学说的复归。清初以来，亦有学者注意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，诸子学逐渐兴起，但这还不是主流。清初思想

的主流是复归于孔孟儒学。

在哲学思想方面，清代亦有较高的成就。如方以智的邃奥缜密，王夫之的博大精深，黄宗羲民主思想显明，傅山富于批判精神，俱有超越前哲之处。惜乎由于政治的原因，方、王、黄、傅的精粹思想在当时俱未能流传，幸而遗编犹存，至晚清才发出灿烂的光辉。而在朝的理学家佐成“康熙之治”，其学说亦有可述者。乾嘉时代，考据之学兴盛，戴震在考据之学上有卓越的成就，同时在哲学上独标新义，对于程朱陆王之说作出了比较深刻的批判，达到了理论思维的新的水平。

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王茂、蒋国保、余秉颐、陶清等同志以数年勤奋研讨之力，撰成《清代哲学》一书，对于清初以来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，包罗宏广，论叙详密，认为清代哲学的主流是回归原始儒学，深窥清学的要旨。二十年代以来，梁启超、钱穆、侯外庐对于近三百年学术均有专著，各有特长，俱称名作。但梁、钱、侯之书都是泛论清代学术，不以哲学为重。王茂等同志此书则主要以哲学思想为范围，内容分析较细，时有新见。这是值得赞许的。王茂、蒋国保同志以书稿征求我的意见，于是略述对于清代思想的认识，提供读者参考。是为序。

一九九一年五年于北京大学

目 录

绪 论	(1)
-----	-----

第 一 编

清初思想形势及哲学思潮

第一章 清初程朱理学派诸家	(13)
一 清初理学的三种类型	(13)
二 熊赐履的理学思想	(14)
三 李光地的理学学说	(19)
四 陆陇其的尊朱黜王论	(23)
五 张履祥的“顺应之道”	(33)
第二章 理学与心学的最后争辩	(35)
一 论争始末及内容概略	(35)
二 关于“心即理”	(40)
三 关于“格物致知”	(51)
四 关于“知行合一”	(60)
五 两家的总论	(63)
第三章 清初社会批判思潮	(70)
一 清初批判思潮的一般特征	(70)
二 黄宗羲对封建君主制的批判	(72)
三 朱彝尊对道学的批判	(77)
四 费密对道统论的批判	(79)

五 阎若璩、万斯同等人经学的批判·····	(84)
六 梅文鼎对占星说的批判·····	(90)
第四章 清初学者对宋儒先天太极说的批判·····	(97)
一 关于《易》象数学·····	(97)
二 宋明学者对先天河洛说的怀疑与批评·····	(100)
三 黄宗羲、黄宗炎、胡渭等对先天易说的批判·····	(105)
四 清初学者考证《太极图》源于道教·····	(122)
五 先天太极批判余论·····	(135)
第五章 西学宇宙论和几何学的影响·····	(141)
一 明末清初的“西学”传播·····	(141)
二 宇宙天体论中的自然哲学问题·····	(146)
三 《几何原本》逻辑方法的影响·····	(161)

第 二 编

清初诸大家的哲学及其影响

第六章 王夫之气一元论的逻辑结构(上)·····	(169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169)
二 “气”——王夫之哲学的最高范畴·····	(170)
三 “物”及其逻辑衍演·····	(175)
第七章 王夫之气一元论的逻辑结构(下)·····	(194)
一 “诚”及其逻辑衍演·····	(194)
二 “德”及其逻辑衍演·····	(214)
三 “生”及其逻辑衍演·····	(227)
第八章 顾炎武的原始儒学精神·····	(234)
一 顾炎武和他的《日知录》·····	(234)
二 关于经学和道统·····	(237)
三 对心学和理学的哲学评论·····	(239)
四 复归原始儒学的宗旨·····	(249)

第九章 颜元的实学思想和对理学的批判·····	(258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258)
二 性形不二、气质不恶的人性论·····	(260)
三 习行经世的实学思想·····	(269)
四 对朱陆两派的批判·····	(281)
五 效法三代、“有以更张”的治世理论·····	(291)
第十章 李塨对颜学的发扬与修订·····	(300)
一 生平与著作·····	(300)
二 对颜学的发扬·····	(303)
三 对颜学的修订·····	(314)
四 关于“颜李学派”的学术公案·····	(321)
第十一章 唐甄的民生意识和心性哲学·····	(328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328)
二 抑君养民的民生思想·····	(330)
三 “心运于中，不因乎物”的本体论·····	(341)
四 “功不见，非性”的尽性学说·····	(346)
五 “成、毁”说和辩证范畴论·····	(357)
第十二章 朱之瑜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·····	(362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362)
二 批判宋儒，倡导实学·····	(365)
三 实学思想的基本内容·····	(372)
四 哲学向实践的转化及其中介·····	(380)
五 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历史地位·····	(388)
第十三章 戴山哲学传人——黄宗羲·····	(395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395)
二 论理气——气外无理、理气不二·····	(398)
三 论心性——性者，心之理·····	(403)
四 黄氏的创见——意为心之主宰·····	(412)

五 论格致、存养——主静与向内·····	(417)
六 论儒学与理学·····	(425)
第十四章 清初北方心学的余波·····	(433)
一 北方心学代表孙奇逢·····	(433)
二 倡导理性独立与精神自由的李颙·····	(448)
第十五章 陈确哲学与王门心学·····	(463)
一 王学知与行、本体与工夫之内在矛盾·····	(463)
二 心性说、理欲论和知行观·····	(471)
三 陈确哲学与王门心学的终结·····	(487)
第十六章 方以智太极一元论的思辨逻辑·····	(500)
一 著述及思想演变轨迹·····	(500)
二 “太极”——“所以”：绝对的本体·····	(504)
三 “太极”本体之逻辑体系的展开·····	(508)
四 思辨之逻辑结构·····	(517)
五 “代错无穷”——辩证的运动与发展·····	(524)
六 主客体“格通”的辩证认识逻辑·····	(528)
第十七章 傅山哲学的批判精神·····	(551)
一 理气观——“气在理先”·····	(551)
二 批判理学——不“辨朱陆买卖”·····	(558)
三 推崇子学——“有子而后有作经者”·····	(562)
四 重“济事”的价值取向·····	(573)
五 “天机”与“气运”兼重的美学思想·····	(575)

第 三 编

乾嘉学术与哲学思想

第十八章 考据学中的哲学·····	(583)
一 清代考据学及其始创·····	(583)
二 考据学中的经验派和理性派两种学风·····	(592)

三 考据学之由分而合、由实而虚、由述而作·····	(601)
第十九章 戴震的人道哲学·····	(610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610)
二 自然观：气化流行的“天道”·····	(613)
三 人性论(一)——命、性、才·····	(617)
四 人性论(二)——自然与必然·····	(626)
五 道德论：有物有则的“人道”·····	(630)
六 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·····	(643)
附：程瑶田的人性论·····	(656)
第二十章 戴震哲学的反响·····	(663)
一 戴震生前与彭绍升、陆耀的讨论·····	(663)
二 来自理学方面的批评·····	(669)
三 戴震学说的辩护者·····	(682)
第二十一章 焦循的“时行”哲学·····	(691)
一 生平与著述·····	(691)
二 源于《易》学、算学的方法论·····	(692)
三 社会哲学：“利”与“礼”·····	(696)
四 政治哲学：“时行”与“变通”·····	(704)
五 变通中的“定”·····	(716)
第二十二章 阮元的仁学新义·····	(724)
一 阮元学术要旨·····	(724)
二 “太极”、“道器”之返虚为实·····	(729)
三 以“节性”、“礼治”为中心的性命论·····	(734)
四 以“相人偶”为释义的“仁”论·····	(743)
附：凌廷堪的“以礼代理”说·····	(753)
第二十三章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·····	(766)
一 关于戴震学术的批判·····	(766)
二 历史理论的哲学基础·····	(776)

三 文化史批判思想.....	(789)
附：崔述的历史怀疑论.....	(794)
第二十四章 今文经学之复兴与龚自珍的历史哲学.....	(804)
一 今文经学的复兴及其主要代表.....	(804)
二 魏源的经学思想.....	(813)
三 龚自珍的经学与历史哲学.....	(819)
结 语.....	(839)
附 录：清代哲学大事年表.....	(859)
后 记.....	(885)

绪 论

本书研究和论述的范围及对象，是清代的哲学。以朝代史为依据，“清代”应自立国到辛亥革命（大致为1640—1911年）。目前通行按社会史分期，以清道光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的起始，因而讲中国哲学史，以后为近代哲学。依此通例，本书所谓“清代”，大体由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（大致为1640—1840年）的二百年间，作为上下断限，而不包括鸦片战争以后。

此二百年间的哲学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，由清初（部分地联系到明清之际）到清康熙末（大致为1640—1720年）的八十年；第二阶段为雍正至道光中叶（大致为1721—1840年）的一百二十年。

清代前中期二百年的哲学发展，显然有上述两阶段的自然划分。前一阶段的主要人物，王夫之、方以智、黄宗羲、顾炎武、傅山、颜元等，他们大都生于明末，学术活动则在清初，学说内容与宋明哲学有相当的联系。这种联系或为对宋明的继承、或为宋明哲学的对立面。后一阶段的主要人物为戴震、阮元、焦循等，他们依据的是新兴的经史考据学，他们继续以宋明哲学为批评对象，而在思想的内容和形式上却有了新的特点。此阶段的后期，则由章学诚、龚自珍等为转入哲学的近代期作了理论上的准备。梁启超所谓清学的“启蒙期”、“全盛期”，大体也作此划分。这个两阶段的分期法，似乎学术界未有异议，大致可以作为定论。

本书内容限于哲学。前此，自章太炎作《清儒》，专论清代学术；继有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、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，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》，侯外庐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》等，均涉及清代的哲学。但作为学术史、思想史，范围自较哲学为广，科学、文化、经济思想、政治思想、考据学、文学等等均属之，哲学自然也是其中一个部分。本书则以论述哲学为主，对范围广大的思想学术史现象，不能一一收入。但从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来说，纯粹形态的哲学并不多见，而往往结合于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科学等方面加以表述，所以本书某些部分不能不稍涉其他，但务以哲学为主。

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上的哲学，二者略有区别。哲学的历史，着重于哲学的派别流分，渊源演变，作用影响，以及有关的时代背景、根源、人物、事件、学说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。历史上的哲学则着重于对历史上出现过的某种(某些)哲学学说作出诠释、分析，当然也要兼顾有关的师承授受、人物始末和学说嬗衍。二者的对象、范围大体一致，而侧重点有所不同。本书体裁为“历史上的哲学”类型，着重论述诸哲学学说和某些哲学现象，因此，定名为《清代哲学》，而不用“清代哲学史”。其所以如此处理，有几个理由：第一，清代哲学诸家，有的前人已有不少研究，特别是清初诸家；但也有相当部分，尚未引起哲学史界的重视。特别是乾嘉时期的哲学，对它们的论述、解释、阐发，需要一定的篇幅。第二，有些方面的内容，需要从有关各家哲学中抽出来，组成综合性专题，辟专章加以论述。如清初的理学、西学传入后的宇宙论、考据学中的哲学等，都必须综合某一方面的若干材料，作系统性的论述，而单独论列。在一般的哲学史，多以人物为单元，这种体例下，专题的论述很难有其位置。第三，清代有些哲学学说的历史遭际比较特殊。清初诸家中，有的著述，刊行远播，成为显学，左右了一代甚至数代人的思想，

如顾炎武。有的则只有部分著述传世，如黄宗羲，其《明夷待访录》清末始问世，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案》亦直到道光后刊行。有的则由于政治原因，长期湮而不显，滥而不传，未能在当时发挥影响，从而发皇光大，如王夫之的全部著作。哲学本有继承性，后人只能在前代思想资料基础之上因变损益；思想的历史链条发生中断，后人就不能全面地接受前人的时代思维结晶，这就造成某种畸形的发展。举例来说，如王夫之哲学，它是当时时代理论思维的精华，理所当然地要有其重要地位。但从社会效果与思想影响来说，在当时几乎丝毫未起作用，迨清末它被发现而加以研究时，则时移世易，时代的课题已经变化，它只能作为历史的“遗物”而供人摩挲了。说它终结了理学，只是今人对它的价值估定，而实际的历史是，理学并未因它而终结。因为绝大多数清代学者尚不知有王夫之其人、其说。清初此种人物甚多，因而，目前均以“历史上的哲学”处理，似乎更为切实。

还有几个关系到清代哲学的性质、地位、特点的理论性问题，因为涉及本书的全局，特在篇首加以讨论。

第一，梁启超《清代学术概论》说：“吾常言，清代学派之运动，乃研究法的运动，非‘主义的运动’也。”（第十一章）这个论点影响很大，以致造成一种“清代无哲学”，或“清初大儒之后无哲学”的普遍印象。此不可不辨。

“主义”，就是某种宗旨及其理论体系。如果说，宋代的“主义”是理学，明代的“主义”是心学，以此例之，清代似乎没有“主义”，有的只是考据学。所以给人的印象是只有研究法，而没有“主义”。然而任何一个时代，都有它的理论思维，都有它的“风气”。清代的理论取向和“风气”，即它的“主义”，就是反思辨（包括理学的、心学的思辨以及佛释老庄），重实学，而以《六经》孔孟为依归。梁启超说：“这个时代的学术主潮

是：厌倦主观的冥想，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。”（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第一章）这个论断大体是对的（它比前之《清代学术概论》大讲文艺复兴要切实得多）。所谓求实、客观，就是撇开宋儒传注，返之于孔孟经典中去探求孔孟本义，这就兴起了考据学。因此，一切反思辨的学者，就从各个方面，汇集到考据学的旗帜下来。在清代初期，王、顾、黄、颜诸大儒，就都有重整经学的呼声，并程度不等地要求恢复原始儒学，乾嘉诸儒则以考据法作了经学的实践。因此我们说，“回到原始儒学”，就是清代的“主义”。

原始儒学是朴素的，不事思辨（或很少思辨），但“性与天道，子所罕言”，确有贬低或排斥哲学的倾向。考据兴起之后，时论往往由排斥宋儒义理进而笼统排斥一切义理。有的学者声言：“吾于大道不敢承，唯以小学治经、说经”，有的则表示：“凡理皆虚”，论“理”则无所是非。看来似乎考据学是没有哲学的。但主张取消哲学者，其所持论，也自是一种哲学。因为要对此加以证明，也要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而自成一种理论，只不过以经验主义、实证主义、实用主义的哲学取代抽象思辨的哲学（如程朱、陆王、佛老）而已。同时，反对思辨主义的人，也要有自己的正面主张；或讲经制、或讲事功、或讲践履、或讲实效，乃至讲烦琐考证，只要这种主张被提到理论的层次上来，它也必是一种“主义”、一种哲学。清代的实学，自颜元、顾炎武已开其端，《四库总目》学者群集其成，至阮元、凌廷堪达至顶巅，他们都有自己的“主义”，自己的哲学。为贯彻自己的主张，又将这种主张化为普遍，而这种普遍性的理论化，就是哲学。再次，从清代学者著述实际来看，前期有王夫之、黄宗羲、颜元诸大儒，后期有戴震、阮元、焦循、章学诚诸名家，还有方以智、傅山的自得之学。拟之汉以后任何一个二百年，其成就造诣，并无逊色。所以，认为清代只有研究法，而无哲学，是不符合历史

事实的。

第二，在清代号为极盛的考据学，与哲学是什么关系。

清代是多种学科并起、专门之学繁盛的时期。天文学、数学、地理学、语言文字学、音韵学、历史学、金石学、名物学、典章制度学、校勘学等(技术学科如医学等，暂不计入)，加上传统的经学、文学等，可谓蔚为大观。其中以经史为对象，运用多种学科知识及新的方法进行研究的考据学，尤为显学。相对而言，乾嘉以后，专讲义理的哲学比较贫乏，这是历史事实。其中，理学、心学的衰敝是有历史必然的。“清世寄名理学(按：此‘理学’包括心学)者，无过反复陈言，其去洛闽、金谿、余姚诸哲，固已绝远”(章太炎《近史商略》，《检论》八)。而在数百年朱陆之争中，双方互相揭露和指摘，各自的弱点都暴露无遗，再经清初诸儒的批判，确已恹恹无有生气，成为绝港焦芽，尤以心学为甚。清人必须在理学、心学之外，别寻新的理论世界观。然而此一时期尚未具备产生新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，他们只能折回到原始儒学去。但是，理学的地位载在令甲，朝廷功令所系，是不便直接加以批评的。因此，早期的反理学者，多采取考证方式，从抉发理学的本末渊源方面，揭露其佛老异端性质，这就发生了太极先天、周程学统诸问题的论辨，而使理学的本体论部分受到很大打击。到乾嘉时期，人们所注意的，是朱熹的经学，尤其是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。要突破宋儒经书传注重围，为原始儒学的复归扫清障碍，就必须发展考据学，以字义名物考证为武器，通过对汉儒经注的整理阐发，来达到上述目的。此风一开，自然附带产生了大量烦琐之说，但有理论修养的学者，是把握了这一方向的。戴震始终坚持“志于闻道”，作《孟子字义疏证》。阮元《论》《孟》论“仁”，焦循《孟子正义》，也都是显例。惠棟、钱大昕也不是不论义理。今文一派自庄存与至龚自珍，都有其义理目的。甚至蔡上翔《王荆公年谱考证》，崔述的疑古书、疑古

史，都有其义理。乃至王懋竑为了捍卫朱学，也反过来使用考证手段，而作《朱子年谱》。当然，有不少学者有意回避尖锐的理论问题，如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等，也有不少人盲目追逐时尚，附庸风雅而从事小学名物考证。但从主流看，有大成就的学者，都有其明确的理论倾向。考据学并不就是哲学，但乾嘉时代的哲学(也可以上溯清初一部分学者)，不能不从考据中过滤出来，而他们既从经书中滤出哲学，也就不能不是原始儒学，或在原始儒学基础上作出新的理论思维。同时，考据学在自己的实践中，也总结出一些具有哲学意味的方法论。所以，就二百年的整个发展看，推动考据学前进的是对哲学(义理)的追求，而达到哲学目的的形式与手段，则是考据。戴震那以义理为“大人”，以考据为“轿夫”的比喻，已说明了二者的关系。梁启超以清初之学为“启蒙”、乾嘉之学为“正统”，认为“此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，为经学而经学”，“正统派则自固壁垒，将宋学置于不议不论之列”(《清代学术概论》第二章)，是完全没有根据的。而此说流传深广，影响甚巨，直接妨碍了对此一历史阶段哲学的研究，于此不能不特加驳辨！

第三，作为一种共同的思想倾向，清代考据学者的理论世界观是什么？前面已经指出，是原始儒学。从顾炎武到乾嘉学者，把这一方向称之为“古学”。“古”就古在他们尊崇先秦两汉儒学，而不取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之说，所谓“绝浮游之空论，卫古道之遗传”。其所以不取玄学、佛学、理学(包括心学)的理由，是认为它们都是“虚”的。其所谓“虚”，含一个“唯心”的意味，虽然当时还没有这个概念和用语。因而，他们标榜的“实”，就或多或少具有“唯物”的义蕴。所谓实事，实物、实象、实证、实行、实践，以及“实事求是”等等，这种种“实”的背后，实为原始儒学。他们认为理学篡改孔孟，而主张以程朱还程朱，以孔孟还孔孟，就是主张用儒学原始教义排除理学